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慾望城市：李永平、漫遊與看（不）見的鬼魂

Sex and the City: Li Yongping, Flânerie and (In) Visible Phantoms

doi:10.6752/JCS.200809_(7).0002

文化研究, (7), 2008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7), 2008

作者/Author：謝世宗(Elliott S.T. Shie)

頁數/Page：45-7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8/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0809_\(7\).0002](http://dx.doi.org/10.6752/JCS.200809_(7).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Sex and the City:
Li Yongping, Flânerie and (In)visible Phantoms

—Elliott S.T. Shie

慾望城市：
李永平、漫遊與看（不）見的鬼魂

謝世宗

誌謝：筆者要感謝幾位匿名審查者對本文的建設性批評，使本文的品質得以在對話與腦力激盪中提升，也要對《文化研究》所有編審人員在審查過程中所表現的專業與謹慎再次致意。

謝世宗，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電子信箱：elliott_emerson@msn.com

摘要

本文引伸漫遊者與卑賤物的概念，討論李永平的《朱鴿漫遊仙境》(1998)，並釐清主人翁朱鴿等七名小女孩作為女性漫遊者，如何影響了漫遊體小說的內容與敘述特質。就漫遊者的主體性而言，她們占據了一個區間的位置：一方面，她們不屬於商品經濟體系的一環，因而避免成為拜物的上班小姐或女性血拼者；另一方面，她們對成人世界的知識提供了批判現實的基礎，拼貼出城市中色情工業、商品經濟與政治權力之間的曖昧關係。妓女與嫖客威脅著保有童真的女性漫遊者，但是色情行業所構成的炫目奇觀，卻也深深吸引著這群初步入城市的孩童。政府一方面鄙棄色情行業為他者，以鞏固自身的道德主體性，但另一方面卻又無法否認色情行業對城市經濟的貢獻，而對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最後，李永平的《雨雪霏霏：婆羅洲童年紀事》(2002)揭示：嫖客與妓女雖是漫遊者眼中的卑賤物，但卻不是可以完全客體化的他(她)者，反倒是男性恐懼與慾望的外射。然而，正因為漫遊者拒絕承認嫖客即是他內心的卑賤物，嫖客永遠在安全距離之外，成為逡巡的鬼魂；正因為漫遊者對自身的慾望以及對女性的恐懼，妓女永遠是無法理解的她者。她們終將如同鬼魂，面目模糊，可以被看見卻不被了解。

關鍵詞：漫遊者、卑賤物、李永平、城市、妓女

Abstract

Through the concepts of flâneur and abject, this paper examines Li Yongping's *Zhu Ling'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highlighting the heroine Zhu Ling as a female flâneur,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sex industry, urban economy and the government, as well as the stereotypes of prostitutes and punters. Better than her male counterpart, Zhu Ling directly engages and negotiates with urban space, discovering its dangers and excitements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streetwalking, Zhu Ling, like a sociologist, reveals Janus's two faces of the sex industry—as a disdained abject and as a fascinating spectacle—and configures an erotic map loaded with contradictions. In the view of the government, prostitutes are immoral subjects whereas prostitution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The sex industry thus becomes an abject from which the self-claimed moral government wishes to, but always fails to distinguish itself—the abject always comes back to haunt the subject. Similarly, although the prostitutes and their patrons appear as others vis-à-vis flâneur the subject, the fear of the temptresses may in fact reflect the weakness of the male subject and the abjective patrons may be seen as a screen on which the subject projects his ugly desire and thereby disavows his inner demon haunting his mind and body. Therefore, prostitutes and punters can only appear in Li Yongping's work as stereotypes, as phantoms that are simultaneously visible and invisible.

Keywords: flâneur, abject, Li Yongping, city, prostitutes

一、導論：漫遊者(flâneur)與卑賤物(abject)

身為台灣現代主義的代表作家之一的李永平，早年即以《拉子婦》(1976)引起文壇的注意，《吉陵春秋》(1986)中的文字煉金術，更是評論者關注與討論的焦點。而在近年來，馬華文學論述興起，許多評論者對李永平的馬華文學屬性與家／國認同政治也多所著墨。至於李永平漫遊三部曲《海東青：台北的一則寓言》(1992，底下簡稱為《海東青》)、《朱鴿漫遊仙境》(1998)與《雨雪霏霏：婆羅洲童年紀事》(2002，底下簡稱為《雨雪霏霏》)，黃錦樹的〈漫遊者、象徵契約與卑賤物——論李永平的「海東春秋」〉一文大約是至今最具批判力的論文。在黃錦樹看來，李永平所批評的對象不過是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亂象：商品經濟將女性商品化，成了男人飽暖思淫欲的消費品。經由靳五與朱鴿的都市漫遊，李永平以近似「文獻寫實」(documentary realism)的手法，見證了消費社會的腐敗，控訴了在台的中國人背棄了與蔣公定下的神聖契約——以建設台灣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的遺志。(黃錦樹 2003：64)然而，小說的漫遊體以「描寫取代了敘述」，導致洋洋灑灑的百萬言書，不過是陳腔爛調的大集合與古奧艱澀的文字迷宮。(黃錦樹 2003：62)至於李永平作為一個現實批判者，為何一方面表現出超高的道德立場，一方面又耽溺於污穢或卑賤物的描寫，黃錦樹引用了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有關卑賤(abject)的理論來回答：他認為李永平作為一個文化的被拋棄者的身分，唯有以書寫卑賤物來昇華他身為「婆羅洲之子的原初污穢」。(黃錦樹 2003：72)

李永平的漫遊體在藝術價值上的高低，也許見人見智，但黃錦樹的文章點出了漫遊者的概念，在漫遊三部曲中的重要性，指向新的討論方向：第一、漫遊者、城市與卑賤物（妓女）的三角關係；第二、漫遊者作為小說的觀視者與小說形式的關連。從這個角度來看，《朱鴿漫遊仙境》是部特別值得探討的作品。雖然它與《海東青》一樣，描述的是布滿情色陷阱的台北，然而不同於《海東青》的男性敘述者靳五，《朱鴿漫遊仙境》裡的漫遊者乃是七個小女孩（以朱鴿為中

心)。她們作為漫遊者的女性身分、她們的年齡與群體性都影響了漫遊體小說的內容與敘述特質。本文除了釐清都市與漫遊的關係外，進一步導入性別的議題，希望對漫遊者的一般性論點，具有修飾與補充的功能。

另一方面，對於小說大量描寫污穢物的傾向，黃錦樹訴諸於李永平作為在台的馬來西亞華僑「搖擺不定的主體位置」來解釋。這樣的理解自然有其說服力，但除了華僑的身分外，李永平同時是都市人與「男性」成年人，正如同他筆下的許多卑賤的角色：好色的大學教授、夜夜笙歌的暴發戶、來台從事性旅遊的日本人。因此克里斯蒂娃的卑賤理論，也許可以放置在都市與男性情欲的脈絡重新來理解。對某些學者而言，克里斯蒂娃卑賤物理論的重點乃是指出卑賤物是自我或本體所唾棄，但卻無法完全排除的東西，它與本體相對但卻又不完全與本體分離，它如同鬼魂總是回過頭來纏繞者本體。(McClintock 1995: 71)或許漫遊三部曲中，幾乎無所不在的妖魔鬼怪，其實正是漫遊者內心慾望的投影。

本篇論文以李永平《朱鴿漫遊仙境》為討論中心，另外兩部漫遊體作品《海東青》與《雨雪霏霏》為對照及補充，借用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的漫遊者的概念與克里斯蒂娃的卑賤理論以釐清女性漫遊者、城市與卑賤物（如：妓女與嫖客）的三角關係。

二、都市漫遊者

法文flâneur意指都市中漫無目的的閒遊者，他以都市景觀與過往群眾作為視覺饗宴；他在群眾之中，卻不是群眾的一分子。在西方，漫遊者的存在至少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巴黎，但這個概念似乎要等到十九世紀中，波特萊爾的文章〈現代生活的畫家〉(Le Peintre de la Vie Moderne, 1863)與其《惡之華》(Les Fleurs du mal, 1857)與《巴黎的憂鬱》(Le Spleen de Paris, 1869)中形形色色的城市漫遊者出現後，才開始在現代性與都會經驗的討論中取得了重

要的地位。¹後繼最重要的詮釋者，當推晚於波氏半世紀的德國批評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他的理解中，漫遊者一方面以大都會(metropolis)為家，一方面走在群眾之外，處在社會邊緣，成了抗拒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英雄人物。(Savage 2000: 38)最後，二十世紀末的學者，重新以女性主義的角度，回顧波特萊爾與班雅明筆下的漫遊者，掀起另一波關於女性與城市空間的辯論——其中的一個議題是女性漫遊者是否存在以及是否為當時的父權意識形態所容許。

吳爾芙(Janet Wolff)認為在十九世紀的性別意識形態對空間的規劃是「男主外、女主內」，因此在公共空間漫遊的女性不是被誤認為妓女，就是招來男性好奇與懷疑的目光。女人並無法如男人般單獨、自在、無目的地在城市裡漫遊，更遑論凝視公共空間中的景物與人群的自由。(Wolff 1985: 45)其他學者則批評吳爾芙高估了當時父權體制的宰制力，並舉出當時至少有兩種女性漫遊的形態：其一是十九世紀新興的百貨公司，提供了中產階級女性自由漫遊、凝視與購物的安全場域。(Friedberg 1991: 421)另一種形態則是女性觀影者的經驗：電影院提供女性一個合法進入的公共空間以及合法的權利融入群眾；電影以影像替代現實的方式，提供了一種類似女性在城市漫遊與無目的觀看的愉悅。(Bruno 2002: 17)然而，百貨公司中的女性消費者與電影觀眾是否可以算是漫遊者，似乎仍有待討論。前者涉及對商品的拜物與占有的慾念，後者並不直接進入具體都市空間進行遊覽與探索；前者掩沒在城市商品的魅影中，後者遠離了實際都市隱含的衝突，兩者都違反了真正「漫遊者」的精神——無目的的漫遊，既在人群之中又對人群保持美感的距離。或者這兩種漫遊形態，不是女性漫遊者存在的證據，反而是標誌著漫遊的終結。(Wolff 2006: 22)

本文的重點自然不是討論十九世紀巴黎是否存在著女性漫遊者的問題，然而以上的摘要卻可以用來檢視朱鴿等七人在台北作為女性漫

1 根據威爾森(Elizabeth Wilson)的研究，1806年出版的一本不明作者的小冊子，描述了都市漫遊者包納姆(M. Bonhomme)的一日。此人所表現的漫遊者特徵，呼應稍後波特萊爾與班雅明筆下的漫遊者。參見威爾森(1992: 94)。

遊者的身分。《朱鴿漫遊仙境》起因於一群國小女生在放學後不想回家，而主人翁朱鴿提議「今晚結伴上街看戲去吧！」她的同學先是表示反對：「又去看電影嗎？多沒意思啊！」「家裡看錄影帶都看膩了啦」。(14)²朱鴿立即澄清，並非戲院的電影，而是大街上五花八門的戲。聽到這裡，其餘六個小女生立刻叫好：

我們上街去看木偶戲布袋戲歌仔戲皮影戲！

還有西洋哈哈鏡！

山東快書四川變臉，讚！

武打戲苦情戲西洋片東洋片國片，一晚看不完！

還要趕一場三級港片，嘻嘻！

西門町街上到處都是戲哦！(15)

這一段對話指出城市漫遊者與觀影作為替代性漫遊形式的差異：電影院表面上是公共空間，但在實質上卻近似家庭空間——二者都確保空間中個人的安全與私密性。因此，對這些小女孩而言，在家看錄影帶與在戲院看電影其實沒有多大差別。再者，電影充其量不過是一組預先安排好的移動影像(moving images)，具備了其內在情節與文類規範上的一致性，不像是都市空間可以提供多元並陳的刺激，其事件發展永遠隱含著不可預測性——你永遠不知道是什麼戲碼將在下一個轉角上演。最後，都市空間不同於電影空間，在於前者具有包覆觀看者成為主角的潛能，而對都市空間的直接參與協商(negotiate)是作為漫遊者的必要條件之一。

另一方面，七個小女孩的經濟地位，排除了她們在當下作為完全消費者的可能性，使作者李永平得以透過她們的目光與口吻批判商品經濟與（性）消費社會。其他關注商品的女性消費者便成了李永平透過七個小女孩的眼光所觀察的目標：

女學生們……結伴走進化妝品專賣店……彷彿誤闖入一座
幽秘的花園，目眩神迷，一步踩探著一步，好半天流連在

2 編按：本文以下引自所討論主要文本《朱鴿漫遊仙境》處，僅以頁碼標示；其他行文間書目格式維持本刊編輯原則。

那滿鋪子繽紛旖旎的光色中，捨不得離開。店門外玻璃櫥窗前，探頭探腦，閒逛的中老年男子們叨著香菸，搔著西裝褲襠，來來回回逡巡不停，不時也斜起兩隻血絲斑斑的眼睛，朝向化妝品鋪子裡窺望。(66-67)

此時，朱鴿在廣場上，看著一排排淑女精品店、一個個女學生與一群圍觀的中年男子，嘆了口氣。女性消費者對商品的拜物反過來將女性物化成爲櫥窗外男性的商品，當女人以目光消費商品，男人則以凝視消費女性。女性消費者如入花園，目眩神迷；男性消費者在櫥窗外，大起色心，往來逡巡。二者都陷落在自己的慾望中而不可自拔。當女性消費者進入商店——一種半私密的空間——她們停止漫遊，而唯有在廣場上冷眼旁觀這一切的朱鴿，在看到商品經濟如何循環再生的過程後，將重新開始她的漫遊。

我們可以說朱鴿的確是符合漫遊者的標準。她的城市如戲劇舞台的比喻則點出城市空間的曖昧性或雙重性：混亂與刺激宛如一體兩面，都市人心理上的疏離與視覺上的親密並存，而漫遊者對都市空間同時採取疏離與涉入的曖昧態度。在主體對客體的距離上而言，「過」與「不及」都無法產生漫遊者。³作為百分百的女性漫遊者，朱鴿的主體占據了一個區間的位置(liminal position)，換言之，非此亦非彼的模糊地帶。⁴其次，作為國小學生的她們不屬於商品經濟體系的一環，但此一經濟體系建構出來的都市奇觀，包括店內的商品、女性消費者與「上班女子」，均提供她們視覺上的愉悅與刺激。朱鴿等人已非天真無邪的兒童，對成人的情色世界有一定的了解，但尚未成爲淪落風塵的成年女子；她們或許是潛在消費者(potential consumers)，將在不久之後蛻變成她們所批判的女性消費者，但在目前卻尚未有購買力，無法完成由凝視商品、被勾起慾望、經由購買滿足慾望的完整消

3 在伯曼(Marshall Berman)的詮釋中，波特萊爾的漫遊者深入日常的都市生活空間，既非理想化也非妖魔化現代都市，而是發覺其危險又迷人的雙重性。(Berman 1988: 142-64)

4 liminality (區間性) 的概念源自透納(Victor Witter Turner)的著作《儀式的過程：結構與非結構》(*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1969)，指涉在合法位置之間的模糊空間，萊恩(Chris Ryan)和霍爾(Michael Hall)借用來討論妓女與觀光客非此亦非彼的曖昧主體位置。(Ryan and Hall 2001: 3)

費程序。一言以蔽之，她們是已經開竅，但尚未死亡的渾沌。(Rojas 1999: 25)對成人世界的知識提供她們理解商品經濟與慾望城市的基礎，而她們未失去的純真不但是墮落的對照，更提供了讀者一個反思的距離與批判的視角。

此外，小說暗示這是她們第一次的城市漫遊，因而她們就如同外國觀光客或新移民，是台北的新來者(newcomers)。對她們而言，台北的亂象尚未被視作理所當然而見怪不怪，或被視為無可救藥而全然唾棄，反而保有一份新鮮感，使她們的漫遊與冒險成為可能。商品的誘惑、男人的欲求以及在背後的消費經濟，這重重的威脅對這七個小女孩而言同時是刺激與興奮的來源。小女孩在夜遊的第一站西門町，就遇到安樂新——惡鬼、皮條客、色魔三位一體。小女孩逃避他的魔爪的過程，在小說中成了冒險遊戲：「一個追，七個逃，大小八個人穿梭在逛街的人群裡，鑽進來，躡出去，團團追逐奔逃閃躲呼叫個不停」(38)。雖然驚叫連連，七個女孩「闖蕩過大半個西門町，心裡頭又是害怕又是得意，一面跑一面轉過頭來，勾起手指招啊招，咯咯笑，不斷逗弄著那氣喘如牛愈追愈慢的安樂新」(39-40)。《朱鴿漫遊仙境》明顯地戲仿《愛麗絲夢遊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愛麗絲因其身材矮小而得以穿過兔子洞，進入奇幻仙境冒險；朱鴿等七人的矮小身材也使擁擠的群眾成了小女孩的保護傘，使她們得以穿梭在行人的大腿下，「跟壞人捉迷藏」(50)。她們利用擁擠的人群及自己得天獨厚的敏捷性將都市空間轉換成孩童的遊戲場域，危險但不致命，刺激但不過度。選擇七名小女孩作為漫遊的主角，除了提供彼此對話的機會，以直接表達對成人社會的批判或對都市奇景的讚嘆外，更充分發揮小孩子一起遊玩的特質，使台北成了冒險仙境，其中的妖魔鬼怪成了遊戲不可或缺的邪惡角色。

與朱鴿相比，《海東青》中的男性漫遊者靳五比較不似波氏筆下的漫遊者對都市空間表現了矛盾曖昧的態度，反而是典型的「男性漫遊者」，與觀察對象有著不可跨越的鴻溝。男性漫遊者不必然是生理上的男性，而是具備傳統定義下男性特質的觀察者：不同於波氏的漫遊者，「男性漫遊者」強調獨立自主的主體性，對群眾與都市採取一

個有距離的、不涉入的觀察角度。由於不涉入，情色充斥的台北只能在靳五的道德目光下，比較是以鬼域的形象呈現，不似朱鴿，除了道德眼光的批判外，還保有一份童心與好奇及相當程度的空間參與，所以不但看見了消費社會的墮落，也看到了五彩繽紛的絢麗奇景。

其次，靳五的男性氣質表現在作為保護者的角色，不只是保護朱鴿免於橫行於台北的妖魔鬼怪的騷擾，也是保護自己脆弱的主體性不因女性的誘惑而瓦解。齊美爾(Georg Simmel)筆下的都市漫遊者，面對外界的過度刺激，自行產生了心理的保護罩，故對都市採取一種「保留的」(reserve)或「無動於衷」(blasé)的態度，以維護男性完整自足的主體。(Simmel 1981: 329)伊斯索(Antony Easthope)將男性主體比喻為城堡：男人的自我(ego)有如城中的司令官，必須時時堅守崗位，區分敵我，並盡全力將「他者」置於視野之內，隨時控管，以便對敵軍的行動迅速反應。(Easthope 1992: 43)在漫遊中，靳五不只是對外界的亂象加以批判和對女性的誘惑無動於衷，甚至常常反應過度，急著運用他的男性力量直接抗拒誘惑：「（靳五）猛一掰硬生生撬開（妓女）那兩隻箍住他頸脖騷啊騷的蒼冷爪子」（李永平 1992：377）。面對妓女拉客，靳五的抗拒近似暴力。這樣的男性暴力，並非男性主體的肯定，反而隱隱承認了主體的脆弱——誘惑必須立即排除，否則星星之火足以燎原。對威爾森而言，男性的漫遊者，不如表面上所見的從容與自信，反倒是在漫遊的過程中帶著焦慮與不安。(Wilson 1991: 109-110)為此，男性漫遊者雖然具備邊緣性格，但不參與群眾成為其中的一員，而是自我疏離成為尾隨群眾的觀察者。他的「不參與」或「疏離」反映的是恐懼與無能，就如希區考克(Alfred Hitchcock)《後窗》(*Rear Window*)中的觀視者，以外加的望遠鏡突出其視覺器官，卻只有反襯出他作為殘廢者的無能為力，反倒是女主角取而代之成了深入賊窟的英雄。《朱鴿漫遊仙境》中的七名孩童漫遊者，以其有節制的放縱，有距離的參與，反而比在都市漫遊的男性更具自信與勇氣，也更能挖掘出都市經驗的矛盾與曖昧。

綜上所述，朱鴿作為年輕的女性漫遊者提供了一個區間的位置，使李永平得以同時描繪都市的艷麗與墮落，同時保有欣賞與批判的態

度。在心智年齡上，她們介於天真無邪的兒童與淪落風塵的成年女子之間，因此有足夠的知識批評成人的情色世界。在經濟地位上，她們並非是襁褓中的嬰兒，毫無消費能力，但也不是拜物的女性消費者，耽溺在商品奇觀中，而比較像是窮人消費者。一方面，朱鴿有零用錢得以為她自己以及六個同學買下七支「七里香」，並懂得如何品嚐這樣的「好東西」(44-45)；另一方面，朱鴿冷眼旁觀這些在商店街上「中了蠱似的」女性消費者，不時覺得「一陣惡心」(125)，表現出對酒店公主的奢侈消費的不以為然。但由於是在台北的首次漫遊，她們尚未視都市亂象為理所當然而全然唾棄，反倒保有一份新鮮感，使她們的奇異冒險成為可能。最後，她們利用自己矮小的身材與敏捷性，將都市空間轉換成孩童的遊戲場域，在其中，仙境奇觀與妖魔鬼怪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相對而言，《海東青》中斬五成熟老成、具有明確的道德意識、急著護衛自己脆弱的男性主體，而在都市與自我之間劃了一道不可跨越的鴻溝，而使台北成了「極端化的」(polarized)罪惡城市，不如朱鴿等人得以挖掘更多都市經驗的矛盾與曖昧。

女性漫遊者與都市空間具有更多的涉入與互動，主體的完整性也在外在的危險下面臨挑戰，而作為男性漫遊者的斬五，則與他所觀察的客體保持了一個水火不容的界限。但這並不表示女性漫遊者便可以完全地排除男性觀物的視角，畢竟在男女漫遊者背後觀看的，還是同一個作者——李永平。女性主義地理學家蘿絲(Gillian Rose)認為：

男性地理學家或作家或多或少仍然要求一個全觀的視角(omniscient)、一座透明的城市與完全知識(total knowledge)，而女性地理學家並非將當代都市發展理解為一個整體(whole)的碎裂過程，而是挑戰全知觀點與其所排除的他者。(轉引自Parsons 2000: 7)

儘管以女性為漫遊者，李永平避免不了全知觀點的誘惑。在倒數第二章〈群玉山頭〉，朱鴿與同學連明心登上陽明山，俯瞰台北盆地，然而她們所看到的不只是台北燈光璀璨的繁華夜景，而且是由街道名稱所組成的中國大地圖，「一片美麗的秋海棠葉，萬古長青，永遠永遠不會凋謝」。(319)在此朱鴿類似迪塞鐸(Michel de Certeau)高高在上的城市規劃者(city planner)，將自己心中的「概念城

市」(concept city)強加在都市居民多元、雜亂、出軌的「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de Certeau 1984: 91-96)在男性的觀點下，都市不再是破碎的、無意義的，而是在靈視(vision)中展現出整體性(totality)。此一男性視角的確立或完成，建立在漫遊的終結上——朱鶴與城市規劃者都不再涉入城市的具體時空，也不再遊走，不再以「移動觀點」(mobile view)觀照人群。

在朱鶴的全視觀點下，台北成了中國的縮影，然而朱鶴的觀點是否代表李永平保守的大中國主義，不無可議之處，因為朱鶴接著指出她們所看到的概念城市，不過是大人們建構的神話，是「見山不是山」的大人污染了「見山是山」的小孩。(321)然而，看穿大人神話的朱鶴是否能拼貼出(map out)城市空間與現代性「多層面與矛盾的展演」(multidimensional and contradictory manifestations)(Felski 1991: 211)；是否能避免男性化的全視與全知觀點，走下「群玉山頭」，重新漫遊，重新發覺被都市所排斥的他者？答案既非肯定亦非全然否定。一方面，小說藉由朱鶴的漫遊，不只表現出對城市空間或興奮、或恐懼的主觀經驗，而是進一步勾勒出色情行業與城市經濟的連鎖關係；但另一方面，在漫遊者眼中，妓女與嫖客始終缺乏與漫遊者的深度互動，而只是在安全距離之外，以刻板印象出現，而此一再現他/她者的方式不能不說是漫遊者的局限。以下兩節將首先釐清「性」與「都市」的共生關係，指出漫遊者具有拼貼都市經濟結構與空間關係的潛能；其次深入漫遊者潛意識中的男性恐懼，以論述李永平作品在再現他/她者上的局限與其成因。

三、慾望城市(Sex and the City)

黃錦樹引用巴赫汀(Mikhail Bakhtin)的話認為李永平的漫遊體以膚淺的現象與情境描述取代敘事與情節的鋪陳，對「諸如民族、國家、城市、社會集團、職業等文化現象的整體性，也缺乏理解」。(黃錦樹 2003: 62)然而，班雅明筆下的漫遊者則具有一種解讀混亂的都市文本，並賦予一致性的意義的意圖。漫遊的目的正是深入社會的黑暗

處又能以社會學家的視野拼貼出社會關係——包含城市、經濟、群眾的互動關係——的「整體性」。本文認為朱鴿在相當程度上，如同社會學家漫遊者(sociological flâneur)⁵，一方面沈浸在視覺的愉悅之中，一方面對城市空間的關係進行解碼，亦即拼貼出城市中色情工業、商品經濟與政治權力之間曖昧而弔詭的共犯網絡。

性與城市自古以來就有曖昧糾葛的關係。中世紀基督教的世界觀與本體論建立在精神與肉體二元的對立上：販賣肉體的妓女，污蔑了其精神的神聖性，自然成為被排斥的她者，然而猶如精神無法脫離身體而存在，妓女是人類社會的必要之惡。類似的二元對立的信念同樣展現在具體的空間結構上：市中心相當於人的靈魂，而都市的邊緣則相對於肉體。因此，妓女被隔離在都市的邊緣，時時受到控制，猶如人的肉體必須時時刻刻接受靈的引導。而政治力——不管是來自教會或政府機構——均致力於維護這個二元對立的空間區隔，以確保社會秩序不受妓女所破壞。(Hubbard 1999: 66)與上述的中世紀城鎮的空間區隔相較，台北城與性產業的關係，不是二元對立，而是共存共生的。娼妓並不被區隔在城市的邊緣，反而群聚在經濟活動的中心，如西門町與中山北路，因此妓可以是在日常生活中，與你我擦肩而過的路人。雖然嫖妓在名義上是違法行為，但與色情行業難以切割的「八大行業」卻是合法，「賣笑」與「賣身」常常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係，儘管二者在法律地位上截然不同。(Chen 2006: 168-169)在以合法掩護非法之下，八大行業蓬勃發展，而且支持了相關的合法周邊產業，如：餐飲業、旅遊業、名牌商店等等。在以消費而非生產為導向的台北，色情行業成為經濟發展的一環。(江迅 1987: 16-18)政府與色情行業的關係同樣曖昧：一方面政府以經濟發展為目標，默許色情行業的存在；另一方面，嫖妓違反中產階級的道德觀，而政府為爭取中產階級的支持，掃黃廢娼成了三不五時就必須上演的戲碼。⁶

5 「社會學家漫遊者」的概念由弗里斯比(David Frisby)所提出，參見弗里斯比(Frisby 1992: 78)。

6 吉文隸在探究西方色情行業發現，色情行業亦帶動許多正規行業：咖啡館成了妓女等待顧客的避風港以及與顧客協商價碼的地方；購買金飾成了妓

戰後初期台北的主要經濟活動包括農業、採礦、商業等等，而在工業化過程中，因其勞力集中的特質，逐漸成了工廠匯集的製造中心直到1960年代末。約從70年代開始，政府爲了遏阻農村人口流失的趨勢，因而鼓勵工廠遷移至鄉村，以提供農業勞動人口額外的就業機會與收入；另外都市地價的上漲與工業污染的疑慮成了企業選擇鄉村作爲廠址的經濟與社會驅力。隨著經濟的轉型與空間結構的改變，台北市在70年代以降已經是以服務業爲導向的都市，一方面成爲各個企業總部的設置地與外貿公司的大本營，形成台灣地區製造業的出口平台；另一方面，隨著收入與休閒時間的增加，消費娛樂性質的產業也大量興起。（Hsu 2005: 18-22; Selya 1995: 78-81）這些發展並不表示製造業已經在台北市絕跡，但李永平所取材的現實是70年代以後台北市經濟活動中的消費娛樂層面則是無可置疑的；再經由文本化的過程，台北成了建立在現實上的「空中樓閣」，成了在某種程度上跳脫具體時空的「仙境」——一個百無禁忌的後現代消費天堂，一個自由展示、交換與消費（人肉）商品的許諾之地，與其說是反映現實，不如說是現實經由文本的陌異化(defamiliarization)後，成了子虛烏有的「惡托邦」，因此成了可以攻錯的他山之石。

女的另類儲蓄方式帶動了首飾店的生意；保姆替身爲母親的妓女提供幼兒照顧；婦科醫生提供性病的整治與墮胎服務；計程車不只是接送妓女與嫖客，也提供妓女一個機動空間以躲避警察。（古文隸 2000：91-103）香港的研究者嚴月蓮與陳欣欣也發現，「在性工作蓬勃的地區裡，街道上其他的商業機構和店鋪往往都會因爲我們的性工作者關門大吉，他們也關門大吉」；都市的空間淨化其實是表面功夫，「警察不願意看見乾淨，因爲他的口袋也會跟著乾淨；政府也不願意乾淨，因爲會影響到稅收和回扣也一齊乾淨」。（嚴月蓮、陳欣欣 2003：191-192）日日春協會在《妓女聯合國》更一針見血地指出：

由於性交易並無被害人，性交易的存在，及它所帶來的許多周邊產業（小吃、美容美髮、計程車、毛巾、服飾、小套房出租……）不勝枚舉，更穩定了許多底層人口的就業經濟問題，若看過去三年（民92-94）全國依《社維法》80條取締成人性交易統計，許多縣市取締人數都只有數十人，可見執政者也清楚大力禁絕帶來的社會成本恐怕比容忍更高。（日日春協會 2007：39）

似乎不論在何時、何地，正式經濟、地下經濟（賣春）與政府都有某種合謀但又互有敵意的緊張關係。

在這個以消費為導向的城市文化中，刻苦持家與勤儉儲蓄的工作倫理，已經被鋪張浪費的消費主義與無所顧忌的享樂主義所取代。(Bauman 1998: 30-32)小說裡寫到台灣人一年喝掉96萬瓶的愛克斯歐白蘭地(XO brandy)，總消費金額大約60多億；又寫到林森北路上停滿了世界名車，包括賓士(Mercedes-Benz)、寶馬(BMW)、積架(Jaguar)、法拉利(Ferrari)等，都是酒店的客人所擁有。(370, 409)故事中的酒店客人（均為男性）所消費的不只是「酒」與「車」的使用價值(use value)，亦即提供口腹之慾的滿足與交通運輸上的便利，更是「名」酒及「名」車的符號價值(sign value)——藉由鋪張浪費的炫耀性消費，以及從事高消費的非生產性休閒活動(non-productive leisure activity)，彰顯自己所具有的傲人財富與社會地位。(Veblen 2005: 21-41; Baudrillard 1998: 61, 77)故事中的女性（多為特種行業的工作者）則是化妝品、名牌服飾、高級首飾等奢侈品的的主要消費群。「公主出遊」一節描寫七個少女公主濃妝豔抹、手握大哥大、手提小皮包、蹬著3吋高跟金縷鞋，逛街血拼，出手之大方羨煞在一旁觀看的高中女生們(119-125)。公主們滿身名牌，在街上招搖而過，其「暴露狂」的姿態，明顯帶有炫耀的成分；而作為觀眾的女學生們，因為羨慕她們的高消費力，而彼此提議「咱們一塊下海吧」(122)——在此，鋪張浪費的消費者，而非勤奮工作的生產者，成了新一代年輕少女模仿的偶像，賣春成了階級流動的捷徑。

買春與賣春的經濟交易行為，在男性與女性消費者之間，扮演了溝通兩者的渠道，並且嵌陷在複雜的城市地景中，與其他正式的與非正式的經濟活動，結合成一張緊密交纏的大網。首先是金融與醫療業隨色情產業的發達而蓬勃發展：風化區九條通，上班小姐們午後2、3點鐘才起床，「上街吃早點，將昨夜的收入存進銀行，順便到婦產科泌尿科診所看病」(134)。在此銀行成了財富累積與個人理財的金融服務機構，而其所發行的信用卡，更是鼓勵消費，或更精確地說，鼓勵過度消費的利器——在上一段所提到的酒店少女，一掏就是10多張信用卡，以及各式各樣的貴賓卡與會員卡，「刷！刷！刷！台北市滿城響起公主刷卡聲」(124)。刷卡的便利性（一刷即可！）促進消費，

不但使商家口袋飽飽，也使金融業生意興隆。另外，故事的城市地貌中，與商店、餐廳、旅館等建築並立的是許許多多的婦產科與泌尿科診所，正表明醫療業正因「性工作」的可能後遺症而發達。布希亞 (Jean Baudrillard) 指出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環境問題，創造了新的需求與消費，例如飲水污染創造了瓶裝水的產業，而新產業又是促進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功臣。(Baudrillard 1998: 39) 同樣的資本主義邏輯下，性交易所產生的生理問題（疾病），創造了更多的醫療需求，提供了醫生與護士的穩定收入；更有甚者，政府必須花費更多的經費，對特種行業進行管理或取締（如故事中政府三不五時的掃黃運動），成了納稅人的另類花費 / 消費，一樣有助於提高國家生產毛額 (Gross National Product)。需求引發更多的需求，消費衍生更多的消費，而不論消費的種類為何，都陷入「成長的惡性循環」(vicious circle of growth) 中，創造了經濟成長與富裕社會的假象。(Baudrillard 1998: 41-42)

其次，與性產業息息相關的還包含商品與食物的消費。在夜晚比白天熱鬧的林森北路，銀樓、服飾店與皮鞋店在三更半夜還開著，正因為「酒店的客人帶小姐出場，先逛街購物，然後到路邊攤飽餐一頓，接著就上賓館辦事」(395)。不論是非正式的經濟活動如路邊攤，或正式的合法場所如餐廳，均提供了嫖客與上班小姐的外食需求，並且如儀式一樣，是嫖客與妓女辦正事之前必要的調情程序。更不用提小說中，如鬼魂般，在風化區遊蕩的日本觀光客，他們不只是情色場所的消費者，更是中山北路許許多多日本餐廳與當地旅館的主顧客。另外商店購物不只是嫖客取悅小姐的手段，服飾、首飾、化妝品還是小姐「身體商品」的銷售工具，用來吸引消費者的目光並刺激購買慾望。李永平便如此描寫滿街的化妝品專賣店：「家家店簷下霓虹招牌爭妍鬥麗，整個店面彷彿搽上臙脂，擦上口紅，妝扮得無比嬌艷，小美人兒般臨街賣笑招徠，眨呀眨只管閃爍著一蕾蕾彩燈，展示著一家家風情萬種的店名」(66)——霓虹招牌裝點店面，為的是招來（女性）顧客，以販售自家商品，就如同上班小姐以化妝品裝點門面，為的是招來更多（男性）顧客，以販售自家的身體商品。因此不管是裝點門面的霓虹招牌，或是女性濃妝豔抹的面容，或是裝飾女性

身體的香水與服飾，都是所謂的商品促銷工具，並且共同將都市形塑為「消費地貌」(landscape of consumption)，將已經理性化、除魅的(disenchanted)現代工業社會重新奇觀化、魅化(enchanting)，允許、鼓勵、甚至強迫民眾消費。(Ritzer 2005: 149-172)如果食物主要在滿足生理需求與口腹之慾，則小姐們所消費的商品（包含服飾、香水、化妝品等）不僅止於需求的滿足，而是本身就是促進消費的工具，以誘使男性進入另一層的消費循環中。總而言之，肉體買賣並不獨立存在於城市經濟中，而是由許許多多的附屬產業如：金融、醫療、旅遊、服飾、房地產來支撐，而前者也促使後者的蓬勃發展。因此在書中，賓館、理髮廳、酒廊、俱樂部、三溫暖等色情場所與正式的營業場合，如：銀行、藥房、診所、商店、餐廳並存，形成台北市的獨特都市地貌。

作為消費者，妓女是其周邊產業的主要顧客，而她們的消費能力來自於另一類消費者（亦即嫖客）的金錢貢獻。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消費是經濟發展的基礎：有人消費才能使其他人有所收入，而收入才能使消費行為繼續發生，並使經濟持續成長。反過來說，如果人人都將現金埋在地下，便打斷了所得的循環流動；消費緊縮的結果，是每個人所得下降，而使整體的經濟蕭條。《朱鶴漫遊仙境》中台北的繁榮景象，正是所得流動不息與消費循環不停的結果。例如，故事中的曾董是涼鞋製造商，由於他的商品有大量消費者（地球上每10個人就有3個穿他的涼鞋！），包括英國黛安娜王妃特地「訂做五十雙中國宮廷式金線繡鴛鴦涼鞋」(354)，才使他成為台灣的暴發戶。而男人（如曾董之流的有錢人）的消費品，除了洋酒與名車外，最主要的便是女人。藉由性交易，男人的所得得以進入女人的口袋，使這些酒店公主成為都市中的高消費族群。正是這些消費族群的存在，使故事中的住宅商業綜合空間「嫖娼大樓」的興建成為可能：一方面，她們是大樓中「精品名店」、「珠寶城」、「仕女休閒俱樂部」的潛力客戶群(219)；另一方面她們也常常買下大樓的「公主套房」或作自住住宅，或作為接客之用(121, 382)。經由購買服飾品與房地產，公主們的所得又（將）回流到建設集團翁董的口袋(190)；而像翁董一樣老板

又是酒店的常客，是公主的衣食父母，或以小說的用語來說，是公主們的「乾爹」(190, 389)。故事中的男嫖客因此在城市經濟扮演了源頭活水的角色：一方面經由性消費，使「上班女子」成為高所得的消費者，得以購買商品；另一方面企業家（也是嫖客）將販賣商品所得加以投資以擴大生產，創造消費空間，如「精品名店」與「珠寶城」，以商品奇觀吸引女性消費者，鼓勵過度消費——二者形成所得的流動循環，並不停擴大生產與增加消費，促成經濟不斷發展。商品供過於求的結果必然是產品滯銷、生產停滯，而故事中的性交易不斷地創造出新的（女性）消費者，避免了生產停滯而導致的經濟蕭條；因此「工作女郎」(working girls)，不但以生產者的身分提供服務促進經濟成長，更以消費者的身分成為螺旋前進的經濟發展歷程的一環。身為消費者，她們以「購買」(purchase)活化了資本的流動循環，是經濟發展中「不事生產的」生產力(production force)。

朱鴿等七人對繁華台北的著迷在書中處處可見，但如果讀者不健忘，色情行業正是都市奇觀的基礎建設。如九條通大街小巷的壓克力招牌，「一窩花蛇似的，糾纏著交疊著，五彩斑斕浮蕩在漫街白茫茫天光中。招牌上妖妖嬌嬌寫著各種花體東洋漢字……」(134)。此段中的蛇的比喻，暗示各式的色情場所，然而這些漢字似乎深深吸引著敘述者的眼光。另一段描述朱鴿七人從山上俯瞰台北，太陽正在西下，「華燈初上，東一盞西一簇，靜悄悄眨著眨著，驀地大放煙火般四下迸亮了起來。山中暮色越沉越黯。花語似的萬家燈火，剎那間一城飛灑開來」(324)。弔詭的是，漢字之所以能成為城市地貌的一部分，成為凝視的街頭「奇觀」(spectacle)，正是因為文字商業化成為招牌的結果；而迷人的台北夜景，李永平口中的水晶宮與「蓬萊仙山」，更是由許許多多色情場所的燈光所合成。社會經濟發展必然帶來消費文化與商品奇觀，其中包括大量商品化的女性，而色情業又反過來成為經濟發展的礎石之一，並構成了都市的奇觀——色情行業同時成為都市奇觀形成的因與造成的果——因此敘事者所讚嘆與鄙棄的對象是一體兩面。也難怪朱鴿等人在批評情色行業與消費文化的同時，本身也無可避免地成為「消費者」，雖然沒有消費任何商品，但卻如同觀光

客一般，以整個城市景觀作為消費的客體。

除了點出色情產業與經濟奇蹟的孿生關係外，小說明白點出政府與色情行業合謀又對反的關連。暑假一開始（1989年7月1日），警政署即推出「雛菊專案」，要在3個月內，將色情行業趕出寶島。(59)第三章仔細描述軍警誓師，要「讓寶島成為真正的三民主義模範省」，「以告慰國父和蔣公在天之靈」，卻在酒店閉門，軍警手持衝鋒槍也不得其門而入的狀況下落幕。(146-161)大掃蕩的描寫啓人疑竇：當色情行業白天正在養精蓄銳準備在夜間大發利市，為何大掃蕩在日落後即停止？掃蕩色情行業竟然需要衝鋒槍，未免誇大不實，給人政府在作秀的聯想。第四章接著描寫一場情色的工地秀，由新東帝建設集團所主辦。接獲民眾檢舉前來關心的楊警官，在游議員與彭里長的斡旋下，「嘆惜了兩聲，認命似的掉頭走出工地去了」(221)。故事情節點出公權力的不張與官商勾結的問題。最後一章，朱鴿等人停止漫遊，深入色情場所（酒店），發覺政府官員游議員不但是酒店的熟客，而且隔天將與500位媽媽桑與其他6位男性議員到市議會陳情，抗議市警局的掃黃。(375)政府與色情行業的合謀共生的關係在此真相大白，也難怪在林森北路大掃蕩之後，「晚上變得更加熱鬧啦」(346)。在小說中，軍警對色情行業的大掃蕩，成為朱鴿眼中的好戲，這是否證實掃黃最終不過是政府演給人們看的一場戲？或政府在政客與色情業者的官商勾結下有心無力？小說明白點出政府對色情行業的態度終究是曖昧不明的。

朱鴿的空間漫遊勾勒出商品經濟、色情行業與「清明」政府之間的矛盾而複雜的關係，隱隱呼應克里斯蒂娃的卑賤理論：色情行業是政府所唾棄的她者，但卻是城市經濟不可分割的一環；掃黃有如卑賤化(abjection)的過程，被壓抑的卑賤物（妓女及媽媽桑），總歸會回過頭來入侵主體（亦即政府）——這樣的過程並非超越時空的心理機制，而是特殊歷史情境下的道德論述運作的結果。在此，也許我們可以人類的排泄物為例，進一步闡述並「歷史化」卑賤理論。簡而言之，在傳統農業社會，人的糞便並不會被視作全然無用的污穢物，反倒是「肥水不落外人田」，是可以被回收、囤積以作堆肥之用的資

源。糞便在農人眼中猶如「黃金」，可以肥沃土壤、滋養作物、為人類提供食物；而食物經由人類的消化道，形成所謂的「糞便」提供水分並滋養生命體，最後再回歸大地，再度進入大自然的再生與循環。從這個角度來看，排泄物並非是卑賤的、污穢的他者(other)，也不具有固定的形式與身分(identity)，而是在整個的食物鏈循環中不斷的轉換、變形與再生的物質。然而，在現代化的衛生概念洗禮下，加之高度的都市化，排泄物不再具有價值，而是人人欲除之而後快的他者。試想，抽水馬桶的設計不正是要將糞便從生活空間移除的最佳發明？按下抽水馬桶的行為，強化並內化了我們對社會所不意欲的他者(undesirable other)的態度——一種將他者驅逐在社會之外，眼不見為淨的心態。(Sloterdijk 1987: 151)可是依據卑賤理論，糞便並非是可以客體化的他者，正因為它曾經提供生命體水分與養分，它與身體具有藕斷絲連的關係。或許正因為如此，尚未社會化的嬰兒，對於品嚐自己的排泄物似乎有某種著迷——它來自於本體卻非等同於本體，它看似客體卻又是本體的分身，它的身分曖昧不明，它非此亦非彼。衛生概念導致排泄物的卑賤化，成人對自己排泄物的憎惡反映了這樣的結果。弔詭的是，我們在潛意識裡頭知道，人體的排泄物無法被徹底清除，它永遠是生命體的一個重要支撐，也因此我們對它的憎惡加倍，因為它提醒了我們身體的原初污穢。

同樣，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傳統的原初社會，妓女在那裡尚未被污名化、尚未受到道德的譴責、尚未成為卑賤物，而是如同其他行業一般擔負起它獨特的社會功能，以確保社會得以順遂運作與發展。然而，在歷史的某一點，發生了老子所說的「大道廢，有仁義」的事件，於是原真喪失，道德論述充斥，人們開始區分善與惡、是與非、貞潔與淫蕩，妓女也就成為卑賤物與她者。如前所述，妓女彷彿是現代城市經濟的排泄物，一方面是城市商品經濟下創造的罪惡與不當的後果，是政府極力排除在城市空間之外的她者；一方面卻又是滋養城市經濟的養分與構成城市奇觀的要角。糞便滋養了生命體，成長的生命體為了維持生存，又創造了更多的糞便；妓女是罪惡城市的產物，但又回過頭來助長了城市經濟的成長，而城市經濟的成長，創造更多

的男性與女性消費者，也因此將吸納更多的女性加入色情行業——李永平筆下的情色都市成了不斷自我成長、自我膨脹的資本主義怪物。

四、三位一體：妓女、嫖客與漫遊者

雖然《朱鴿漫遊仙境》一書點出政府將色情行業卑賤化的現象，主人翁朱鴿卻無法避免這樣的心理機制；不論是妓女或嫖客，在朱鴿眼中全是與自己相對的卑賤物：對比七個小女孩身上常有的沐浴乳香味，公主麗人永遠是手握大哥大，腋窩泛起一陣汗酸，而幾乎所有的男人，都有戀童癖，滿腦子想著性，如鬼魅般在暗夜的城市中遊蕩。黃美儀就認為李永平筆下均是一些扁平人物(flat character)，是由一組組定型的符號所構成。（黃美儀 2004：24）嫖客與妓女的形象尤其複製了大眾心中的刻板印象。「上班小姐」不可避免地成為女性血拼者——妓女與女性消費者都具有過度的女性慾望：前者對性的慾望與被慾望的慾望，由突出的腋毛來象徵；後者對錢的慾望與對商品的拜物主義上。男性嫖客的形象更是單薄，他們不是以高額金錢買春的暴發戶，就是日本來的退伍軍人買春團，再不就是街上如行屍走肉、欲求不滿的中老年人。這些一而再、再而三出現的刻板印象，不得不歸之於漫遊體的限制。

當漫遊者在大都會中快速遊走，漫遊者成了人群的窺視者(voyeur)；群眾不是面目模糊，就是落入可資辨識的刻板印象窠臼。由於在都市漫遊的過程中，人與人的互動雖然頻繁，但相處時間卻短促，當漫遊者碰到一個陌生人時，不得不根據外在線索，像是行為、穿著、談吐等，快速地依照腦海中的社會刻板印象加以分類。(Sennett 1971: 365)或許愛漫遊的朱鴿與李永平從未停下他們匆匆的行腳，從未與他們眼中的卑賤物有深層的互動，因此朱鴿與都市中的嫖客與妓女僅僅具有觀看與被觀看的關係，自不能深入她者（妓女）與他者（嫖客）複雜的內心世界。嫖客總是視七個小女孩為潛在的性消費商品，意欲誘導她們誤入歧途；而妓女除了作為消費者外，只在酒

店的場景扮演了救援小女孩免受男人侵犯的角色：當曾董事長意欲以5萬塊的價格，要小女孩中賣花的柯麗雙像其他的公主一樣為他下跪倒酒時，一名中年豔婦領著七名公主進入包廂解圍，柯麗雙才「如見救星……拍拍心窩鬆了一口氣」，離開酒店。(365)此一互動，點出妓女人性化的一面；她們不願意見到七名小女孩如此年輕就誤入歧途，而警告她們夜遊的危險，並要她們「趕快搭公車回家」(356)。但總體而言，七名漫遊者與被觀看的卑賤他（她）者之間缺乏互動，而這或許正是黃錦樹批判李永平的漫遊小說失之膚淺的主因；不但都市成了破碎的意象集合，他（她）者——由於與漫遊者總是保持一段觀視距離——將永遠成為扁平的、刻板的、缺乏心理深度的他（她）者。

《朱鴿漫遊仙境》中漫遊者與妓女膚淺的關係，除了以漫遊體的限制來解釋外，也許對於身為男性的李永平而言，妓女作為她者將永遠是「沒有深度的表面」(depthless surface)，因為她們畢竟屬於另一個世界，男性作家自然無法進入她者的內心，僅能以世俗的刻板印象來加以詮釋。然而《朱鴿漫遊仙境》的續集《雨雪霏霏》似乎提供了另一個解答。故事中的主角回到男性漫遊者的角色，不只是帶領讀者在作者記憶中的馬來西亞與台北漫遊，更重要的是進入一位男性敘述者的內心世界，由都市漫遊進入心靈漫遊的層次。在此，朱鴿不再是主角，但也不是降格的伴遊者的角色；她成了男性漫遊者李永平的對話者(interlocutor)——如果蘇格拉底(Socrates)是真理的接生婆，藉由詰問與爭辯探求真理，則朱鴿同樣經由聆聽與對話，逼問出李永平心中不可告人的秘密、挖掘他壓抑在記憶深處的真實、揭露出他所詆毀的卑賤物不過是他心魔的投射。

在〈桑妮亞〉(Sonia)一章，李永平向朱鴿描述他獨自在萬華夜市漫遊，誤入紅燈區寶斗里的經歷。雖說是誤入，但李永平老早在南洋時就知道寶斗里的大名，一座在男同學口中傳頌的「伊甸園」。在台

7 男性敘事者在這本小說中為李永平，但因為小說畢竟是虛構，敘事者的故事不必然就是小說家李永平的親身經歷。以下討論所提到的「李永平」，指的是小說的敘事者，而非作家本人。

北漫遊的李永平「著了魔似的，身不由主」地，朝著寶斗里的方向前進。在歷險的旅途上，他看到搔著褲襠踉蹌走避的嫖客；夢遊般逡巡在甬道的歐吉桑；各式各樣帶著一窩窩汗酸、脂粉、月經的氣味的妓女。當媽媽桑扯起嗓門喚客，李永平「摀住耳朵……落荒而逃」，卻陷入一座「盤絲洞般紅灑灑燈影迷離的四合院裡」，在那「五六十個姑娘紛紛伸出胳膊，扯起嗓門一疊聲向我召喚」（李永平 2002：66）。弔詭的是李永平此刻的救星竟然是八個日本嫖客；跟著這些識途老馬，李永平找到了出路，鑽出了寶斗里深處的紅院子（李永平 2002：67）。

與《朱鴿漫遊仙境》中的小女孩一樣，敘述者李永平也是個台北新鮮人：一個外來的僑生，一個好奇的都市漫遊者。但不同於朱鴿保持了「遊」的精神——涉入都市又保持獨立自主——李永平不但在寶斗里迷路找不到出口，無所不在的「她者」（妓女）更直接威脅到他的主體性。《海東青》裡的斬五的男性主體在李永平身上更顯得脆弱，妓女與媽媽桑的呼喚猶如賽倫(Siren)的歌聲，使過路客迷失在慾望的大海裡；漫遊者李永平必須掩起耳朵，拒絕誘惑。正因他隨時隨地面臨危險，必須時時刻刻保持警戒，他也少了「遊」的興致與瀟灑。如果《朱鴿漫遊仙境》中的小女孩，具有將都市轉化為遊樂場(playground)的能力，則《雨雪霏霏》中的漫遊者是常常提心吊膽，面臨著被都市空間所吞噬的危險。

另一方面，李永平所見到的嫖客形象延續《朱鴿漫遊仙境》中的負面且扁平的刻板印象。但朱鴿的詰問揭露了敘事者李永平所不願面對的真相——他與這些嫖客並無不同：

我問你，那天晚上你到底有沒有進去？

進去哪裡呀？

寶斗里的妓女戶！那個什麼臨春閣、望仙閣……那些小姐站在門口招手叫你進去，你到底進去了沒有呢？

我……忘記了……。

你騙我！還說你在尋找你的桑妮亞呢。你是個壞蛋！跟別的男人一樣壞。我恨你。（李永平 2002：69）

經由朱鶴的反詰逼問，讀者嗅到了李永平故事中未被敘述的污穢部分：事實上，李永平並沒有成功抵抗賽倫的誘惑，如他所宣稱的，而是在同學口中的伊甸園接受了夏娃的蘋果。回憶中有著紅色燈光的四合院，可以解讀為女性陰器的象徵，而李永平正如那八個日本人一樣，早已進入妓院，亦即，進入妓女的身體。他成了他眼中卑賤的嫖客，而這正是他生命中不能承受的重量。

對於朱鶴的詰問，李永平的回答是既不承認也不否認的「我……忘記了」——創傷、記憶與壓抑的辯證在此達到高潮。一方面，李永平對於妓女的存在採取同情的角度，對於《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小說中的俄國妓女桑妮亞——一個17、18歲的姑娘，為了全家的生活，到街上去賣春——尤其不忍。當李永平在寶斗里尋尋覓覓時，朱鶴認定他是在追尋那個桑妮亞——李永平彷彿是要扮演一個拯救者的角色。但朱鶴在最後揭穿了李永平的「謊言」，他「跟別的男人一樣壞」：拯救者成了加害者，批判者成了共謀者，漫遊者成了卑賤的嫖客。「我」即「卑賤物」，「卑賤物」即「我」，這樣的記憶被壓抑在心底的最深處，但卻無法完全拭去彷彿從未發生。朱鶴的詰問猶如黑暗中的一道閃電，劃入男性敘述主體的記憶城堡，一瞬間照亮了主體與卑賤物同一(identical)的時刻。⁸然而這是李永平不願面對的真相，或者說，這個真相，李永平僅僅只能以回憶自己的遺忘來面對；那真實揭露的時刻一閃即逝，李永平點出心魔的存在，但「我……忘記了」這個回答拒絕進一步探索的可能性。

王德威在閱讀《海東青》第十一章〈一爐春火〉時質疑，靳五全程參與教授的春宴，對年輕女子大肆意淫，但「卻顯得立場模糊不清」，「是什麼力量使他（靳五）可同流但不合污？」靳五「對小女生們頻頻投以關愛的眼神，到底出自什麼動機？」「他對少女墮落的悲愴……是否仍難掩自我撇清的嫌疑？」（王德威 2001：102）或許我們可以說李永平心中的魔，即是流動的慾望，常常超出理性的韁繩與自我(ego)的操控，在超我所劃分的疆界——善與惡、純潔與骯髒、

8 閃電的比喻援用自克里斯蒂娃(1982: 8)。

崇高與卑賤——氾濫成災。李永平的戀童情結或許不僅僅是「屬於理念而不牽涉情慾」（陳瓊如 2003：401），因為慾望如脫韁的馬，並不尊重理性與感性的界限(borders)；李永平不知何時會從傑凱爾醫生(Dr. Jekyll)轉化成海德先生(Mr. Hyde)而對朱鴿施加毒手，成了在《朱鴿漫遊仙境》中如鬼魅般遊蕩的嫖客。李永平曾說：「千萬不要以為我批評的是台北市，而是成人世界，包括我自己」（賴素鈴 1998：127）——或許這段話並非是謙抑厚道之辭，而是成年男子赤裸裸的真情告白。或許李永平在潛意識裡頭知道，卑賤物本是主體的一部分，而將此卑賤面向投射到他者（其他嫖客）並加以批判，正是自我撇清的手段。

如果我們可以接受此一推理，則李永平在面對她者時，以幾種不同書寫策略化解心中對她者的慾望。《海東青》中的靳五是典型的「男性漫遊者」，自我疏離成爲尾隨群眾的觀察者與批評家，也因此在此《海東青》中常常如同隱形人或隱藏式攝影機，僅僅呈現出社會亂象而不參與，也就藉此掩蓋了其內心騷動的男性慾望。靳五的自我疏離是最單純的自我防衛形式，將她者極度妖魔化，並劃下不可跨越的界限，以確立自己的道德主體、否認男性慾望並保護脆弱的男性自我。《朱鴿漫遊仙境》中的小女孩作爲被慾望的角色出現，巧妙地置換了李永平的男性慾望。當靳五一旦身處情色場所，馬上就被批評家質疑，「是什麼力量使他可同流但不合污？」而身爲女性漫遊者，朱鴿可以縱情凝視她者，而無需擔心瓜田李下之嫌。但不論是靳五或是朱鴿，這些漫遊者總是與她（他）者保持一段觀視距離，而無法探索她（他）者的社會生活與內心的複雜性。比較而言，李永平在《雨雪霏霏》中直接面對心中的男性慾望，點出自己心魔的存在，但「我……忘記了」這個選擇性失憶，拒絕了進一步探索她（他）者的可能。也難怪妓女與嫖客在李永平的小說中永遠是扁平的、刻板的、缺乏心理深度的卑賤物。

五、結論：漫遊者與遊魂

本文首先援用波特萊爾漫遊者的概念，藉由閱讀《朱鴿漫遊仙境》以釐清朱鴿等七人的女性身分、年齡與群體性如何影響了漫遊體小說的內容與敘述特質。這些孩童漫遊者利用擁擠的人群及自己得天獨厚的敏捷性將都市空間轉換成遊戲場域，她們對都市空間的直接參與協商，點出都市刺激但危險的曖昧性。就漫遊者的主體性而言，她們占據了一個區間的位置：一方面，她們不屬於商品經濟體系的一環，因而避免成為拜物的上班小姐或女性血拼者；一方面，她們對成人世界的知識提供了理解商品經濟與慾望城市的基礎。然而台北的亂象尚未被視作理所當然而見怪不怪，或視為無可救藥而全然唾棄；在這些新加入的年輕漫遊者眼中，台北的情色奇觀反而保有一份新鮮感，不似靳五的眼裡僅僅是可厭又恐怖的鬼域。她們不但看見了消費社會的墮落，也看到了五彩繽紛的絢麗奇景。雖然身為女性漫遊者，朱鴿也有表現出男性觀點的時刻，首先在高山上俯視的全視觀點下，台北成了中國的縮影；其次，她們一方面沈浸在視覺的愉悅之中，一方面又如同社會學家漫遊者，對城市空間的關係進行解碼，亦即拼貼出城市中色情工業、商品經濟與政治權力之間的關係。這些成長前的女孩，在某方面表現出雌雄同體的特質，比純粹的男性漫遊者更能挖掘出都市的多面性與矛盾性。

漫遊體不是沒有缺陷，如某些批評家指出，李永平以膚淺的現象與情境的描述取代敘事與情節的鋪陳，複製了大量的刻板印象。然而朱鴿的漫遊儘管不夠深入，但也拼貼出城市經濟的矛盾：色情行業的存在支持了相關的合法周邊產業，成為經濟發展的一環與城市奇觀的一部分；男性的性消費又使得其生產所得可以回流到「上班女子」身上，創造出高所得的女性消費者，進一步促進經濟發展。在政府眼中，色情行業卻成了城市經濟的卑賤他者：一方面政府以經濟發展為目標，默許色情行業的存在；另一方面，嫖妓違反中產階級的道德觀，成了政府意欲剷除的對象。然而正如克里斯蒂娃的卑賤理論所指出，色情行業作為卑賤的他者實際上乃是主體的一部分，不可能完全

切割，或者更精確地說，政府作為道德的主體，必須經由不道德的色情行業來確認。政府既不能消滅娼妓，也不想真的消滅娼妓，於是政府公開反對娼妓，私下縱容色情行業的存在。《朱鴿漫遊仙境》至少勾勒出政府、色情行業與城市經濟之間合縱連橫卻又互相排斥的愛恨情仇。

以上的都市論述雖然勾勒出色情工業、商品經濟與政治權力之間曖昧而弔詭的共犯網絡，但是作為他／她者的嫖客與妓女的面貌仍然曖昧不明。這樣的不足一方面可以歸之於漫遊體的局限：漫遊者的快速遊走，難以與群眾產生密切互動，僅能為他／她者戴上刻板印象的假面。另一方面，李永平對他（她）者的探索懸崖勒馬，反映出他內心的恐懼。藉由閱讀《雨雪霏霏》〈桑妮亞〉一章中，敘述者李永平「漫遊」寶斗里，成為嫖客的一員，卻又在記憶中加以壓抑的行為來看，本文認為《海東青》與《朱鴿漫遊仙境》中的嫖客／卑賤物即是漫遊者李永平本身的投射。他對嫖客的鄙視與卑賤化正是自我撇清的手段，正是漫遊者的道德主體得以建構的基礎，正是對自己內心的男性慾望的壓抑與否認。而對妓女的鄙視實際上隱含著漫遊者對自己內心慾望的恐懼，如果不是禁不起誘惑，漫遊者何須掩耳以拒絕賽倫的歌聲呢？漫遊者豈不是正如無能的城堡主帥，只能以緊閉城門來維護自己的男性主體的完整？因此，作為卑賤物的嫖客是漫遊者主體的一部分，妓女作為卑賤物也是男性恐懼的外射。正因為漫遊者拒絕承認，嫖客即是他內心的卑賤物，嫖客永遠在安全距離之外，成為逡巡的鬼魂；正因為漫遊者對自身的慾望以及女性的恐懼，妓女永遠是無法理解的她者，而《朱鴿漫遊仙境》也在朱鴿等七人成為「酒店公主」（妓女）之前結束。因為拒絕書寫，嫖客與妓女在《朱鴿漫遊仙境》中僅僅以鬼魂的形式而存在：雖然漫遊者看見他（她）們，卻又總是無法看得真切；他（她）們雖然若有似無，被排擠在安全距離之外，卻也無所不在，糾纏著漫遊者——全只因漫遊者心中有鬼。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王德威。2001。《眾聲喧嘩之後》。台北：麥田。
- 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編。2007。《妓女聯合國》。台北：正港資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吉文隸。2000。《歐洲情色交易檔案：西方妓女問題面面觀》。台北：唐山出版社。
- 江迅。1987。〈父權宰制下的人肉市場——台灣色情產業的政治經濟分析〉，《南方》4：9-19。
- 李永平。1992。《海東青：台北的一則寓言》。台北：聯合文學。
- 。1998。《朱鴿漫遊仙境》。台北：聯合文學。
- 。2002。《雨雪霏霏：婆羅洲童年紀事》。台北：天下文化。
- 陳瓊如。2003。〈李永平——從一個島到另一個島〉，收錄於《李永平自選集（1968-2002）》，李永平著，頁399-405。台北：麥田。
- 黃美儀。2004。《漫遊與女性的探索——李永平小說主題研究》。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黃錦樹。2003。《謊言或真理的技藝：當代中文小說論集》。台北：麥田。
- 賴素鈴。1998。〈顛覆童話——訪談李永平談《朱鴿漫遊仙境》〉，《聯合文學》14.1：126-127。
- 嚴月蓮、陳欣欣。2003。〈香港妓權運動的啓蒙〉，收錄於《性工作研究》，何春蕤編，頁189-198。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二、英文書目

- Baudrillard, Jean. 1998. *The Consumer Society: Myths and Structur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Bauman, Zygmunt. 1998. *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Berman, Marshall. 1988.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 Bruno, Giuliana. 2002. *Atlas of Emotion: Journeys in Art, Architecture, and Film*. New York: Verso.
- Chen, Mei-hua. 2006. "Selling Bodies/Selling Pleasure: The Social Organisation of Sex Work in Taiwan," in *International Approaches to Prostitution: Law and Policy in Europe and Asia*, edited by Geetanjali Gangoli and Nicole Westmarland, pp. 165-184. Bristol: The Policy Press.
- de Certeau, Michel.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lated by Steven Rendal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Easthope, Antony. 1992. *What a Man's Gotta Do: The Masculine Myth in Popular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 Felski, Rita. 1995. *The Gender of Modern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riedberg, Anne. 1991. "Les Flâneurs du Mal(l): Cinema an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in *PMLA* 106.3: 419-431.
- Frisby, David. 1992. *Sociological Impressionism: A Reassessment of Georg Simmel's Social Theory*, 2nd version. London: Routledge.
- Hsu, Jinn-Yuh. 2005.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Base: From Industrial City, Post-industrial City to Interface City," in *Globalizing Taipe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patial Development*, edited by Reginald Yin-Wang Kwok, pp. 16-34. New York: Routledge.
- Hubbard, Philip. 1999. *Sex and the City: Geographies of Prostitution in the Urban West*. Aldershot: Ashgate.
- Kristeva, Julia. 1982. *Powers of Horror. An Essay on Abjection*, translated by Leon S. Roudiez.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cClintock, Anne. 1995. *Imperial Leather: Race,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Colonial Conquest*. New York: Routledge.
- Parsons, Deborah L. 2000. *Streetwalking the Metropolis: Women, the City, and Modern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itzer, George. 2005. *Enchanting a Disenchanted World; Revolutionizing the Means of Consumption*. Thousand Oaks: Pine Forge Press.

- Rojas, Carlos. 1999. "Paternities and Expatriatisms: Li Yongping's Zhu Ling manyou xianjing and the Politics of Rupture," in *Tamkang Review* Vol. XXIX No. 2: 21-44.
- Rose, Gillian. 1993. *Feminism and Geography: The Limits of Geograph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Ryan, Chris and C. Michael Hall. 2001. *Sex Tourism: Marginal People and Liminalities*. London: Routledge.
- Savage, Mike. 2000. "Walter Benjamin's Urban Thought a Critical Analysis," in *Thinking Space*, edited by Mike Crang and Nigel Thrift, pp. 33-53. London: Routledge.
- Schonfeld, Christiane. 2000. "Streetwalking the Metropolis: Prostitutes in Expressionism," in *Commodities of Desire: The Prostitute in Modern German Literature*, edited by Christiane Schonfeld, pp. 110-130. Rochester: Camden House.
- Selya, Roger Mark. 1995. *Taipei*.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 Sennett, Richard. 1990. *The Conscience of the Eye: The Design and Social Life of Cit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 Simmel, Georg. 1971.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in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 Selected Writings*, edited by D. N. Levine, pp. 325-339.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loterdijk, Peter. 1987. *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 translated by Michael Eldre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Turner, Victor Witter. 1969.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Chicago: Aldine Pub. Co.
- Veblen, Thorstein. 2005.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London: Penguin.
- Walkowitz, Judith. 1992. *City of Dreadful Delight: Narratives of Sexual Danger in Late-Victorian Lond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ilson, Elizabeth. 1992. "The Invisible Flâneur," in *New Left Review* No. 191: 90-110.
- Wolff, Janet. 1985. "The Invisible Flâneuse: Women and the Literature of Modernity," in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3: 37-46.

- . 2006. "Gender and the Haunting of Cities (or, the Retirement of the Flâneur)," in *The Invisible Flâneuse? Gender, Public Space, and Visual Cul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Paris*, edited by Aruna D'Souza and Tom McDonough, pp.18-31.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